

我的第二次揭发和交代

王 秀 珍

同志们：

这段时间来，参加了党员干部会议的小组会和大组会，这几天又参加了大会，听了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同志们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的愤怒声讨和深入揭发，对我所犯严重罪行的揭发和批判，都深深触及了我的灵魂，使自己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越听越认清“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死敌，越听越感到自己犯了难以饶恕的严重罪行。我诚恳接受同志们对我的罪行的揭发批判。这些年来，我紧跟“四人帮”，吹捧“四人帮”，效忠“四人帮”，死保“四人帮”，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活动，跟着“四人帮”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堕落成为吸工人血、与工农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为“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做了大量坏事，自己罪行是极其严重的。我们敬爱的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再三的教育我、挽救我，同志们不断地帮助我、促进我，继续给我揭发、交代的机会，要我戴罪立功，将功补过。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同志和大家对我的希望和要求，决心彻底揭发“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犯的严重罪行。现在，我向同志们作第二次的揭发和交代。

一、交代我同“四人帮”的密切关系和吹捧

“四人帮”、效忠“四人帮”的罪行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去北京参加九大。五一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把上海新选进中央的几个同志叫去，说江青要见见我们。在一间会客室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见了我们。江青还热络地和我们照相，说是留作纪念。实际上是拉拢我们，笼络人心。当时，张春桥还对我们说：你们现在不是一般的造反派头头，而是高级干部了。各种力量都在争夺你们，不要被人争夺过去。这话显然是别有用心。张春桥所谓的“各种力量都在争夺”，就是分裂党中央的一句黑话，就是要我听他的话，不要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提醒我，

把他的话说在心里，照着去作，不跟毛主席，不跟党，只跟张春桥。

九大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回厂劳动了一段时间。劳动期间，给张、姚写了封信，讲了劳动情况和自己体会。后来，这封信批发给各中央委员。这件事，我对张春桥是感恩戴德的，感到他很重视和培养我。张春桥还在“接见”一些“造反派老头头”的时候，表扬了我。我劳动结束后，张春桥又找我去向他汇报劳动体会，对我的汇报他表示满意，他还装模作样地要我多读点书，说我理论水平太低。当时，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对我关心，实际上完全是为了拉拢我，要我死心塌地地跟他走。

一九七〇年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上海去的几个人，同张、江、姚他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到庐山的当晚，江青就到我们住处来看我们。江青吹她过去怎样在浦东当教师，怎样在香烟厂搞地下斗争，等等。自己听了以后，中毒很深，更为钦佩她。回上海后，在好些地方，吹捧江青，吹她怎样搞地下斗争等。我还要卷烟厂写过江青当年在厂里的“斗争事迹”材料（搞出过一份初稿，后来没有搞下去）。这完全是为江青树碑立传，无耻地为她吹捧。我就是想牢牢抱住江青这个粗腿，对自己有好处。我想过这份材料如果搞得好，树了江青，也树了自己。

在九届二中全会时，还听江青说过，她的病就是受刘少奇、陈伯达这些人迫害造成的。二中全会闭幕时，她又来看上海的几个人。她说：陈伯达要炸庐山，他们有枪杆子，有飞机，我们是赤手空拳，等着他们来炸，等他们来抓。当时以为她指的是陈伯达一伙。实际上，江青的矛头是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解放军的领导同志的。联系到后来江青大肆诬蔑、攻击解放军，联系到王洪文后来哀叹“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可见他们早就有了乱军篡军的反革命野心。

一九七〇年底，江青来上海，“接见”王洪文、徐景贤和我等，那时我还感到很“荣幸”。当时看到张春桥写字台上有本《哲学小辞典》，我说现在在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些问题搞不懂，这本辞典正好用上。江青就对张春桥说：让政治局给每个中央委员都送一本小辞典。果然，不久，《哲学小辞典》就发下来了。那时，还以为江青关心我们学习，曾为此又给她吹捧过。

一九七一年，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江青有次对我们说：我住的地方，鬼都不登门。要我们到她那里去。后来，王洪文、徐景贤和我等去过她那里。那次，在她书房里，要我们随便坐。在她写字台上，摆着很多她拍的照片和她过去的照片，有在延安时拍的照片等。这是有意在向我们进行自我宣扬和吹捧。后来又领我们到摄影室，为我们拍个人的和集体的照，拍集体照时她和我们坐在一起。以后又领我们到放映室，看了一部写宫廷政变的美国电影（片名大概是“罗马之战”）。江青所以要我们看这个电影，说明她不仅自己象林彪一样，研究古今中外的“政变经”，而且还要向我们灌输这种反革命思想，使我们成为她搞反革命政变的依靠力量。这次回来后，我把江青给自己拍的照，到厂里涂上塑料薄膜，在房间里挂起来，还感到很

“光荣”。感到她信任我，我就要处处效忠她，报答她，忠实地执行她的“指示”。这说明思想上中毒是多么深。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徐景贤和我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江青在参加我们的大组会时说：林彪怎样迫害她，给她吃过量的安眠药等。实际上过去她跟林彪是拉得很紧的，林彪吹她为“旗手”，她直到“九·一三”前不久还为林贼拍照。但是，当时我听了江青的话，很相信，回上海后，我也吹过，把她捧为反林的“英雄”。也吹嘘我们几个人，在庐山是跟着江青、张春桥他们反陈伯达的。

一九七三年，参加十大。江青到上海大组，吹她自己当有人要选她进政治局常委时，她坚持不同意。实际上江青早有野心，她不仅想进常委，而且想当党中央主席，是个大野心家、反革命的两面派。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很相信，而且也散布过。

参加四届人大时，江青“接见”我们，对我们说，她衣服破了还在穿，鞋子也坏了，等等。实际上，江青完全是一个伪君子，一个十恶不赦的两面派。那时，我们请她到上海来。她说：是啊，我是要来的，要到造风庆轮的船厂去看看，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来看看。现在看来江青这些话，是有恶毒用心的，她还要抓住风庆轮做文章，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那次，我回上海后，就到某造船厂等处为之吹捧，说什么“春暖花开的时候，江青要到造船厂来”，“我们要作出新成绩，迎接江青，向江青汇报”。实际上我就是在为江青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大造舆论，造成极坏的影响。毒是我放的，某厂党委是没有责任的。那一次，她还送了一些油莎豆给我，要我们种。回来后，我要某单位作为“政治任务”种了一些，还专门写了封信给她。

今年二月，到北京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江青来看过我们两次。那次，她对我说：你这个人大咧咧的，能象我那样在政治局被整上几个月就好了。她讲的“大咧咧”，当时我还不理解，后来知道是“傻乎乎”的意思。她这样说，矛头是对着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暴露了她对毛主席、政治局对她的批判是十分仇恨的，是完全抱着对抗态度的。二月二十一日晚上，马、徐和我等人去看江青时，她大肆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解放军的领导同志，放了不少毒。我们临走时，还要她“保重身体”，“继续领导我们战斗”。这不仅是无耻的吹捧，而且要她来“领导战斗”，这是反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她送了我们两本地图和一些文冠果的籽，她说：“这是油料作物，让全国人民都有油吃。”江青到处以个人名义送材料，送种子，包藏着想当党中央主席，统治全中国的反革命野心。当时，我们拿了她送的东西，还感到很“荣幸”，到处为她宣扬，这是十分反动和可耻的。

我同王洪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之前，我就认识了王洪文。后来听说他是保卫科干部，共产党员，更相信他。曾请

他到我所在的上棉三十厂介绍过他是怎样造反的。到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前夕，王洪文提出，把我从厂里调到工总司。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又是王洪文提议，让我参加代表团到北京祝贺，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此，我对王洪文感恩不尽，觉得是他带我出来工作，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一九六八年，王洪文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又听他透露过毛主席曾找他谈话，问得很详细，一谈几小时。这样，更感到王洪文了不起，认为他是上海工人的代表和首领。听到张春桥也为王洪文吹捧，说什么：在党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曾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但是当时实权操纵在李立三的手里，现在我们党要培养出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这些黑话，我听了深信不疑，对王洪文、张春桥更是紧跟猛靠，拚命抱住这个大后台。以后，自己当了中央委员，接着当了市委书记，我以为这都是王洪文、张春桥对我的重用。十大时，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他神气起来了，我也感到神气起来了，有了这个大靠山，腰杆子更硬啦。我经常吹捧王洪文，吹他是我们（工总司）的“好司令”，还把他在上棉十七厂的一间办公室，作为造反“老窝”保存起来，为他大肆树碑立传。有一次，我带了一帮小兄弟到王洪文的这个“老窝”去“观摩”，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要大家更效忠于王洪文。还有一次，有位同志要调中央工作，我就带了一些中委和候补中委，又到王洪文这个“老窝”去了一次，吹捧王洪文，吹捧“四人帮”。我这样无耻地吹捧王洪文，拚命为他树碑立传，矛头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反毛主席的，这是我难以饶恕的一条罪状。

一九七二年九月，王洪文调中央工作，临走时对我说：有事要多同总工会的一些老头头（即小兄弟）商量商量，多做他们工作，多依靠他们。这个话，我记得很牢，也是这样去做的。王洪文同徐景贤有矛盾，王洪文告诉过我：你可要注意，不要被争取过去，要同一些老头头在一起，要放炮。我看到有的人瞧不起我，工作上有困难，就去向王洪文诉苦，王洪文说：不要怕，有什么事，你可以找马老，找我，找张春桥。这样，我更感到王洪文的确是支持我的，是帮助我的。我们每次去北京，都要到王洪文那里去，他请我吃饭、看电影。他每次都问起他这帮小兄弟的情况，表扬黄金海这个人工作有能力，有水平，陈阿大工作有进步，马振龙工作有魄力，要我多“团结”这些人。参加全国四届人大时，王洪文叫廖祖康来找我、马天水、金祖敏等人去他那里吃饭。吃的是法国大菜，从上海运去的蛤蜊，连盘子都由飞机运去的。王洪文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崇洋迷外到了何等地步，完全是吸工人血的党内资产阶级，我们也跟着吸了工人的血。去年，我参加人大常委会会议时，王洪文叫我和金祖敏、陈阿大等人，到他那里去。当时金祖敏正在筹备工会代表大会，王洪文提出要安排十几个所谓“老造反”当代表，如戴立清等人。我感到其中有的人有问题，估计张春桥不会同意。我回上海后，就同马、徐商量，为了不得罪张春桥，就把这十几人的名单预先送给张春桥。果然张春桥怕扩大王洪文的势力，批了意见说：这些人已有

了安排,可以不参加全国工代会。张春桥批了后,王洪文只好也画了圈。但是,过了两天,王洪文要廖祖康打电话给我,把我狠批了一下,说我太傻啦,为什么不把这十几个人夹在代表名单里一起报,这样人家就看不出来了。我吃了批评,又怕得罪王洪文,最后同马天水商量,还是把其中两个人夹进代表名单里。从这件事情中,也可以看出王洪文同张春桥内部是有矛盾的,是狗咬狗的斗争,马天水同我就在这中间搞折中、调和,两面不得罪,两面讨好,这也暴露出自己的丑恶灵魂。

这几年来,我同王洪文、廖祖康经常通电话,有什么比较大的事情,有关工会方面的事情,我都向王洪文“请示”,同时问问外地情况。廖祖康也常打电话来。今年以来,通过这样几次电话:

今年一月,周总理逝世,我要求到北京去向总理遗体告别。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在电话里别有用心地说:你们不要来了,要认真抓好工作,要以深入批邓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正当广大干部、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时候,我却跟着“四人帮”打着批邓的幌子,布置机关党委要抓紧批邓,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紧密配合“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被粉碎后,四月八日凌晨三时,王洪文打电话给我,问上海情况,我说了些情况,他在电话里攻击首都民兵说:有的有民兵没有汽车,有的有汽车没有民兵,不配套,再加上北京是单行道,结果时间拖长了。这一点你对外不要讲。王洪文实际上是在耍两面派手法。他还说: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有经验的,但也要吸取这个教训,要民兵指挥部作好部署,把我的意见告诉指挥部。第二天,我就去民兵指挥部,传达了王洪文黑“指示”的精神,要他们作好部署。王洪文的所谓“部署”,实际上就是要为反革命武装叛乱作好准备。“四人帮”发动反革命叛乱是早有预谋的,我积极参与了这个阴谋活动。

毛主席逝世后,我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打电话给王洪文,我向他讲了这几天跟马老跑了几个工厂了解情况,还汇报了一位同志参加一个部门领导核心,并问他对当前工作有什么“指示”。他就在电话里说:现在有少数人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要做工作,要把群众的情绪引向搞好工作,深入批邓。他还说:各方面的关系要搞好。最后,他讲了一段关键性的黑话,他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会有人要抬出邓小平来的。这一段黑话,暴露了“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怎样迫不及待,暴露了“四人帮”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怎样的刻骨仇恨,也流露了“四人帮”深感自己处境孤立,内心恐慌。这次打电话的内容,我曾给叶昌明、陈阿大、汪湘君等人透露过一点。没有过几天,肖木到上海,带来了张春桥的口信,口信中的黑“指示”同王洪文在电话中讲的黑话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我就中毒更深,紧跟“四人帮”,死保“四人帮”,一直到策划反革命武

装叛乱，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妄图以武力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犯下了难以饶恕的反革命罪行。

回想这些年来，我所以要这样紧跟“四人帮”，效忠“四人帮”，完全是为了抱牢这个大靠山，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张春桥这伙人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拉拢我，而且从经济上收买我。我把自己命运、前途和“四人帮”连在一起，只要“四人帮”得势，自己就有前途；“四人帮”垮台，自己也就完蛋。因此，我积极参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成为他们的一名得力干将，在修正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自己的罪孽越来越大。现在，我一定彻底揭发、交代，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二、交代结党营私，纠集一帮小兄弟，组织宗派小集团的罪行

王洪文在总工会有一伙小兄弟，这是“四人帮”苦心经营、精心培植的一支别动队，是“四人帮”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打手队，是王洪文的亲信宗派小集团，也是一个胡作非为、作恶多端的流氓集团。我就是其中一名主要成员和干将。

这一伙人中，有的本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洪流中泛起来的一些沉渣，慢慢地聚集在一起。经过几次变化，到一九六七年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小集团，主要成员是：黄金海、戴立清、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和金祖敏等，后来还有汪湘君、施尚英，参加这伙人活动的还有原来的支左干部王日初等二人。这伙人的头目就是王洪文，王洪文到北京去后，就由我领头。

这是一伙什么人呢？黄金海家里有关管的对象，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死在监牢里的罪犯。黄金海本人就是一个流氓、阿飞，被称为“黑司令”。在文化大革命中，善于搞打砸抢一套，为王洪文所赏识，一直把他当作亲信。一九六八年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时，王洪文派他当工宣队六办头头，此后一直窃据市革委会财贸组的领导地位，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是王洪文手下的一名得力的情报员和干将，是财贸系统的一个霸王。黄金海的问题，群众早有反映，早有暴露，但是王洪文竭力包庇，不许别人动他一根毫毛。我也跟着王洪文，保他、捧他。去年，机关党委反映黄金海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严重问题。机关党委把这份材料给了我，我给马天水看。马天水把这份材料转给黄金海本人看了。这时，解放日报也反映了黄金海这方面的问题，马天水也把报社的这份情况给黄金海自己看了。当时，我也在场。我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是包庇行为。黄金海看了这些情况，就打击报复揭发他问题的同志，并且向王洪文“告状”。王洪文对我们大发脾气说：限制法权，怎么限制到市委、市革委会常委头上来啦，要放宽点嘛。他还要我们不要再搞这样的材料了。黄金海有王洪文这顶大黑伞，更是有恃无恐，横行不法。

戴立清，从兰州倒流回沪，生活腐化，一直是个临时户口。文化大革命中搞打

砸抢,为王洪文所网罗,成为王洪文的心腹和得力干将。以后,王洪文派他当工宣队三办头头。林彪自我爆炸后,上海成立王维国专案组,王洪文要戴立清当专案组的负责人,这个专案组由王洪文自己直接抓,不许别人过问。戴立清在这段时间中,经常到我家里进进出出,打得火热。戴立清掌握了大权,身价百倍,到处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可一世,甚至胡作非为,乱搞男女关系,搞得乌烟瘴气。他的问题暴露后,由王洪文、我、马天水和金祖敏包庇下来。后来,又把他调到小三线任党委副书记。那时,马天水早就对他封官许愿,说过:你先到小三线去一段时间,慢慢再把你调到工交组来。对于这样一个腐化堕落的流氓分子,竟然让他入了党,当了领导,可以看出“四人帮”的组织路线完全是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黑线。

陈阿大,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工作、不学无术的流氓,就是因为他效忠王洪文,为张春桥、王洪文所看中,把他捧上工交组的领导地位,塞进市委常委会为“列席常委”。陈阿大入党做官后,称王称霸,欺压群众,胡作非为,民愤很大。

马振龙,是王洪文的心腹和保镖。马振龙曾经是李、戚集团的一名干将,也是由王洪文一手包庇下来的。王洪文把他安插在轻工业局,任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利用手中职权,源源不断地为王洪文提供各种轻工业品,从吃的各种食品、烟酒、糖果,到最新的各种手表、照相机等等,应有尽有,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更得王洪文的信任。马振龙有王洪文这个大靠山,就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凌驾于局党委之上,谁也不放在他眼里,谁也碰不得他。

还有叶昌明,紧跟王洪文,为王洪文所赏识,一直让他霸占总工会的领导职务,还把他塞进市委常委会为“列席常委”。王洪文通过我和叶昌明,利用总工会干了很多坏事,力图把总工会变成“四人帮”大搞阴谋破坏活动的一个黑据点。广大工会干部是没有责任的,根子在“四人帮”,罪责在我身上。

象这样一些人,所以能够窃据这样一些重要领导职务,就是因为有王洪文、张春桥这顶大黑伞。“四人帮”豢养这帮小兄弟充当特务、打手、爪牙、死党,这帮小兄弟依靠“四人帮”当作大靠山。这些人,张春桥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就结识了。张春桥扶植王洪文,通过王洪文培植、支持、控制这一帮小兄弟。张春桥扶植这一伙人,是为了控制上海工人运动,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张春桥标榜自己是什么“最支持上海工人运动的”,“最早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他还经常说:我背了两个包袱,一个是工总司,一个是文攻武卫。他就是要依靠王洪文这伙小兄弟,控制工人运动和工人武装,用心十分险恶。但是,他也怕这伙小兄弟闹得太不象话,给他捅漏子,所以他要经常给这些人“敲木鱼”、“做工作”,大耍两面派,大搞又拉又压的权术。张春桥每次从北京回上海,总要专门“接见”这伙小兄弟,即所谓“工人造反派的一些老头头”,笼络感情,收买人心,加强对这一伙小兄弟的影响和控制。

王洪文当了市委书记后，每次遇有比较大的事情，或者市委要召开什么会议，事先都要同这伙小兄弟“通气”、“商量”。王洪文对我说过：这些老头头，对文化大革命是有感情的，无论怎么样，他们是不会反文化大革命的，这些人对我们是有用的。这些话，清楚地暴露了王洪文所以要搞这样一个亲信宗派集团，就是因为对实现他的政治野心是十分有用的。当王洪文在一九七二年九月要调到中央工作时，他对我说：你以后有事情多找这些老头头（即小兄弟）商量商量。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每当开展什么运动，召开什么重要的会议，我都找这伙小兄弟开会商量、通气。这样做，是结行帮，搞宗派，自成体系。我为了讨好王洪文、张春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保牢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处处依靠这帮小兄弟，竭力笼络他们，明知有的人有问题，还是跟他们打得火热，拚命包庇他们。我知道没有这帮小兄弟对我的支持，我的地位就会不稳，王洪文也不会对我满意。有一次，机管局有位同志反映黄金海、陈阿大等人在饭店里大吃大喝，我听到后，不仅不支持这位同志的正确意见，相反，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王洪文。王洪文马上说：这个人过去表现也不好，把她调回到工厂去。我按照王洪文的黑“指示”，就对这位同志加以打击迫害，把她调走了。我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包庇小兄弟，讨好小兄弟，讨好王洪文，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保自己。这说明我同这帮小兄弟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臭气相投，相依为命，互相包庇，互相利用；同时，因为这些人有王洪文撑腰，我也怕得罪他们，说明自己私心重，骨头软，为了保持自己地位和乌纱帽，什么事情都肯做，什么原则都会出卖。完全是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因此，我和这帮小兄弟，是抱成一团的。我经常找他们开黑会，散布和议论了很多反动言论。

比如在批林批孔时，我经常找这伙小兄弟议论，分析形势，传达“四人帮”的黑“指示”的精神，商量怎样把各区、县、局的火烧起来。实际上就是以批林批孔联系实际为名，挥舞“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大棒，任意对不合自己心意，不紧跟“四人帮”的新老干部，扣帽子，打棍子，轻则大会检讨，重则靠边审查以至撤职下放，整了一大批好同志。

批林批孔时，找这伙小兄弟议论的另一个内容，就是攻击和分裂军队的领导同志。我把王洪文“乱军”的精神通给大家，并且肆意攻击某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领导同志，破坏军政、军民团结，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我攻击了好几位军队领导同志，把不跟“四人帮”的，都说成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新生力量，对他们进行诬蔑、攻击。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反动的，矛头是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破坏了军政、军民的团结，起了极其恶劣的分裂主义的作用。“四人帮”要阴谋篡党夺权，就要蓄谋篡夺军权，我跟着“四人帮”积极参与反军乱军、分裂军队的阴谋活动，充当了反军乱军的炮手和打手，犯下了严重罪行（关于乱军反军的罪行，我要作专题的交代）。

在批邓斗争开始后,我也找这伙小兄弟作过议论。我对这些人说过:现在斗争很复杂,很尖锐,你们在各条战线、在各个组办工作,发现有什么好的材料要报给我,下面有什么动向要及时报告,实际上是为“四人帮”收集情报,制造炮弹。我还说过:现在从国务院各部委来看,除了文化部等少数几个部外,都是跟邓小平的,问题不少;从各省市来看,除了少数还比较好以外,有一些地方问题也不少,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有怨气,不服气,要出气”的,大整造反派。我们上海是幸福的,有三位领导在中央,我们要搞好自己工作,要为他们争气,不要让他们在北京感到为难。这些话都是极其反动的,为“四人帮”吹捧,为小兄弟打气,要这伙人紧跟“四人帮”,效忠“四人帮”,为“四人帮”争气,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指向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周总理逝世后,我还极其错误地在这伙小兄弟中说过:现在大家都很悲伤,但是对于哭也要作分析,各人有各人的哭,我们在哭,有的资本家也在哭(这些黑话,马、徐和我在一起也议论过)。我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我罪该万死。

在中央今年一号文件下达以后,正好金祖敏就要回北京,我就把一伙小兄弟找到一起,在议论中,我散布过攻击、诬蔑华国锋主席的言论,矛头是对着毛主席、对着华主席的,我罪该万死。在议论中,还大肆吹捧张春桥,说中央文件是他起草的,水平高,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造舆论,作准备。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多次同祝家耀通电话,问他北京情况。这期间,我同一伙小兄弟连续开过两次黑会。我把从祝家耀那里听来的情况通给大家,连造谣、污蔑首都民兵的言论都告诉给他们。我还说北京很紧张,我们上海也要作准备,民兵、公安都要有准备,工、青、妇群众组织要掌握好动向,那里出现问题,就要在那里及时做工作。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我也找这帮小兄弟议论过。说什么今后斗争可能会更复杂、更艰巨,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还说什么中国可能分裂,发生内战;还“鼓励”大家说,不管怎样,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准备,最后终是能取得胜利的;等等。这些黑话,马、徐和我三人也一起议论过,矛头都是针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是反革命的叫嚣,是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进行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这样,一直到十月八日,我伙同这帮小兄弟,共同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把他们作为反革命叛乱的核心力量,这就完全是必然的了。

以上讲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这个以王洪文为大头目、我为二头目的宗派小集团,是“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大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的得力工具。我在这方面犯了很大的罪,我一定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王洪文去年下半年在上海所作所为和小兄弟的有些问题,我给张

春桥、姚文元告过状,但是,没有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我是有罪的。当时我向张、姚告状,目的还是为了保“四人帮”。)

三、交代在执行“四人帮”的招降纳叛,自成体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方面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他们在组织上大搞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在党内自成体系,培植亲信,包庇坏人,打击异己,置人死地,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他们在组织上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散布的种种谬论,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和破坏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破坏党的九大、十大的决议,破坏十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破坏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妄图实现他们“改朝换代”、“大换班”,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野心。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我们的党就要变修,我们的国家就要变色,我们的人民就要遭殃。“四人帮”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是条罪大恶极的叛党叛国、祸国殃民的大黑线。这些年来,我忠实地、积极地执行这条黑线,干了大量坏事,犯了难以饶恕的罪行,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搞组织上的准备,我要彻底交代、低头认罪。

这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提出了与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相对立的,完全是任人唯亲的所谓培养、提拔干部的标准。这就是张春桥几次对我们讲的,所谓“领导熟悉”和“群众拥护”。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张春桥在一份关于干部问题的材料上写道:“可以上上下下,不要都弄上来,问题在于群众是否拥护他们,领导是否熟悉他们。”王洪文也讲过这样的意思。所谓“领导熟悉”,也就是“四人帮”熟悉,我们熟悉;所谓“群众拥护”,实际上就是拥护“四人帮”,拥护我们。只要拥护“四人帮”,为“四人帮”所熟悉的,信得过的,对“四人帮”有“感情”的,不管什么人,不管乌龟王八蛋,他们都要收罗起来提拔重用。象前面讲到的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等人,明明知道他们有严重问题,还是加以重用,就是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对这些人很“熟悉”,熟悉这些人死心塌地忠于“四人帮”,拥护“四人帮”,熟悉这些人心狠手辣,能够充当“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打手、走卒。我对于张春桥提出的这个标准,是积极忠实地执行了的。提拔、任用干部时,总要通过组织组和总工会举办学习班,我亲自去座谈、“相面”,大肆吹捧“四人帮”,鼓吹“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培养对“四人帮”的“深厚感情”。然后根据对“四人帮”的“感情”,决定对象的取舍。这方面,我是犯了很多罪的。

“四人帮”这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完全是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有一次,王洪文曾经懊恼地对马、徐和我说过:我办了几期工农兵读书班,选了一批

人,有军队的,有地方的,但是可惜没有来得及安插这些人。可见王洪文办读书班,抓干部,完全是为了培植亲信,实现其反党篡权的目的。现在回想起来,每当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或者开展大的运动的时候,“四人帮”就拚命抓干部工作,要我们挑选对象,准备名单,这完全是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组织内阁的需要。一九七一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外事工作,准备接待尼克松时,张春桥对我们说:“现在到联合国去的,都是戴眼镜的,当大使没有工人出身的”,提出上海要“培养工人大使”。外事工作是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周总理亲自抓的,张春桥背着中央要上海“培养工人大使”,实际上是妄图把周总理架空,夺周总理的权,篡夺外事大权,这是“四人帮”的一个罪恶阴谋。我们接受了这个黑“指示”,办了工人外事干部培训班,经过挑选,招收了八十名学员,动员时讲明是培养工人大使的,完全是封官许愿。培训班搞的也是修正主义一套,要大家拚命钻外语,学外事知识,有的把身体也搞垮了。这个班毕业时,听说中央指出了这种搞法是错误的。但是,张春桥、王洪文他们还心不死,提出分配时要集中。我根据他们的黑“指示”,还为大家打气,说什么今后可能有人还会当大使,要大家积极干。参加培训班的这些同志是不知道这个阴谋的,是没有责任的。我们这样搞,积极为“四人帮”效劳,犯了罪,也害了一些工人同志。在十大召开之前,我们秉承王洪文的黑旨意,要总工会、组织组办了好几期学习班,挑选人选。十大召开的时候,张春桥、王洪文突击搞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其目的就是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安插自己“熟悉”的亲信,扩大自己的势力,为篡党夺权作准备。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张春桥一方面鼓吹“权、权、权”,大讲“夺权”的重要和必要,另方面强调“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要大胆提拔干部,要有一个规划,不仅考虑到上海需要,还要考虑到全国需要。这些黑话,充分说明“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打倒一大批,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当时,我积极执行了这些黑“指示”。王洪文要我和金祖敏由组织组、总工会连续办了几期学习班,选拔对象。接着,又由市委办了六期工农兵读书班。按照张春桥提出的“标准”,经过挑选,汇编了准备“输送”到中央的名单。第一次经过我们讨论,提出了一份三十人的名单,其中担任部一级的十八人,担任司局一级的十二人。后来,到一九七五年又搞了一份十六人的名单,都是担任部一级(根据王洪文黑“指示”,准备去一机部、六机部、建材部、商业部、卫生部、外贸部、公安部、组织部和工、青、妇等十一个部)。这些对象,都是经过我、金祖敏、王日初等人分别亲自座谈、“相面”,培养对“四人帮”的“感情”,选拔出来的,最后经过马、徐、黄涛和我等人商量定的。这些名单实际上都是“四人帮”为了“组阁”所需要的。当然,这些被选中的同志并不了解我们搞的阴谋,是没有责任的。搞阴谋,干坏事,犯了罪的,是我,根子是“四人帮”。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日初从北京回到上海,带来王洪文的黑“指示”,要我们抓

紧时机,对“区、县、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实际上就是要把一些区、县、局的领导班子进行大换班,把一些“四人帮”不中意、不熟悉,不忠于“四人帮”的人调走、撤换。张春桥怕阴谋被人发觉,就提出要分批动,不要一下子全面动。根据这些黑“指示”,我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对一些区、局的领导班子分批进行所谓“调整”。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就要任人唯亲,就要搞突击提干、突击建党。“双突”的发明人就是“四人帮”,发源地就在上海。早在召开九大前,张春桥就提出要让陈阿大和另一人当九大代表,当时这两人都不是党员,因时间紧迫,就突击发展入党。总工会一帮小兄弟中,差不多都是这样由张春桥、王洪文指名突击发展入党的,有的人(如叶昌明)是王洪文通过马天水和我把他拉入党内的。在批林批孔时,按照“四人帮”的黑“指示”,不问具体情况如何,大批“歧视、压制新生力量”,到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就来了个大发展,几个月时间里,发展入党的就有×万×千多人。不是说那时发展入党的人不好,应该说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是这条路线不对头,不是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有的是自上而下点名发展,我自己就点名发展过,有的本单位通不过,就到别的单位发展,造成了不良后果。“四人帮”搞阴谋诡计,要两面派,我也是跟着这样干的,明明是在上面点名发展、突击提干的,但是在去年组工会议上,我却不承担责任,不作自我批评。我还学着王洪文腔调指责下面,说什么“发展错了一个人,也是路线问题”。

“四人帮”这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大肆培植亲信,包庇坏人,打击异己,置人死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实行法西斯专政。凡是“四人帮”看不中意的,或者是某句话、某件事触犯了他们的,他们就要加以打击压制,扣上“老右”、“对文化大革命没有感情”、“敌视新生力量”的大帽子,非要置于死地而后快。凡是对他们表示不满,更要扣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给以无情打击,残酷镇压。比如市革委会专案办的两位负责同志,因为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在讨论一些专案报告时,发表了同张春桥、王洪文不同的意见,就此遭到了张春桥、王洪文的打击,专案办工作结束后,迟迟不给安排工作。市革委会统战小组有位领导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表示对王洪文的讲话稍有点意见,就此王洪文骂他是“老右”,几次要把他调离统战组。在这些事情中,我都是跟着张春桥、王洪文积极干的,充当了打手,犯了很多的罪。在包庇坏人方面,除了前面讲到的一帮小兄弟外,突出的事情是:一九七四年陈丕显同志解放时,王洪文要我们提出一批“老造反”的名单,说要“落实政策”。张春桥、王洪文说:是给陈丕显看,他的对手还在。王洪文早就说过:老干部犯了那么多错误,还落实了政策,这些老造反、新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犯了一些错误,有什么大问题呀,难道就不能落实政策啦。王洪文是打着“落实政策”的幌子,蓄意要包庇坏人。当时,根据他的黑“指示”,我们提出了一份一百八十一人的名单。其中有大家都知道的曾任工总司副司令的某某某,此人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品质极其恶劣,完全可以判

刑。但是，张春桥对这样一个社会滓渣，却点名要安排他的工作，因此安排为总工会常委，到后来又犯了一连串严重错误，才不得不又下放工厂劳动。这以后，张春桥还几次批评我，说不应该叫他下去。还有一个人，曾任工总司联络站的头头，因奸污女知识青年，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了严重罪行，被判徒刑五年。对于这样一个人，就是因为是“老造反”，我就按照王洪文的“指示”，不仅免于刑事处分，而且在服刑期间的工资全部补发。还有个“老造反”，也曾任工总司联络站头头，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根本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已经回厂劳动。在这次所谓“落实政策”中，竟然把这个人调到上海在外地的一个原料基地担任工会工作，还把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把他家属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基地。还有一个“老造反”，是从外地倒流回上海的临时工，因犯有一条人命案被公安机关拘留审查，依法应该判刑，后来由王洪文指名把他放出来，并且被指名发展入党，调到区革委会任工交组负责人、区房地局党委书记。象这样的人，还有一些。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经过我们的手，把他们包庇下来的，有的还加以提拔重用。这完全是包庇坏人，是犯罪行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

这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一只手是包庇坏人，另一只手就是打击报复，排斥异己，置人死地。王洪文、张春桥排斥、打击异己的手段是很毒辣的。王洪文曾露骨地对我说：“凡是不听话的，都弄到五七干校去，弄到崇明去，办他两年学习班。”张春桥也想利用干校作为他整人的工具，有次，我们提出原来的干部比较多，怎么办的问题时，他就凶狠地说：“干部多下来，都到干校去。”“四人帮”竭力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篡改和歪曲五七干校的办校方针，妄图把干校变成他们整人的工具。这几年来，我忠实地贯彻“四人帮”的黑“指示”，整了不少同志，犯了不少罪。如对某某某同志，从九大开始，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指使、怂恿下，我就对她有看法，以后一有机会就整她，一直整到批林批孔运动。还有对奉贤县的一位同志，因为同我有不同意见，我也整过她。在讨论县委委员人选时，我因为对她有看法，就不同意让她参加县委。这也是对她的打击报复。这些都说明自己紧跟“四人帮”，学会了用高压手段对待干部和群众，使自己完全站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对立面，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同广大工农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走资派。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十分痛心的，我痛恨“四人帮”，也痛恨自己犯的罪行。过去，我站在“四人帮”立场，给“四人帮”干坏事是积极的、勇敢的；现在，我要彻底转变立场，积极、勇敢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同时积极、勇敢地清算自己的罪行。

这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还另搞一套，完全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比如背着党中央，上海搞了所谓“列席常委”。这也是张春桥、王洪文提出来的。张春桥说过：市委常委会人少，可以先吸收一些人参加常委活动，以后就可以增补。开始吸收了

几个“列席常委”，后来王洪文要塞进他的人，张春桥也要塞进他的人，列席常委越来越多，居然大大超过了正式常委。市委这样做，区、县、局党委也这样做，这就完全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还有，区、县、局党委的一把手，张春桥一忽儿提出要统统让老干部当，他的目的就是出了问题就好整老干部；一忽儿又提出要让新干部当。他这样做，就是要挑拨新老干部的关系，谁不听他的，他看不中意的，不管是新老干部，都要挨整、撤换。对各组办、各区、县、局党委的班子，张春桥为了控制实权，提出轻纺系统的人不要再安排了，怕王洪文的实权大；王洪文也要安插自己的人，一再要安排自己的小兄弟和亲信。我们(马、徐和我)就来个折中调和，但是不管怎么样，搞的都是任人唯亲，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政策。

张春桥、王洪文利用总工会，培植势力，安插亲信，把工会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张春桥早在一九七二年，“接见”工代会的部分委员时，就说过：“工代会下的命令，支部要执行，不执行是错误的，不通可报告上级党组织。”这就是公然宣称，工会可以自成体系，发号施令，而且下级党组织要服从和执行工会的命令。王洪文更是牢牢抓住总工会的领导权不放，把总工会搞成独立王国，凌驾于各级党组织之上，竭力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我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积极去干。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而且也派党委干部。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〇年以来，总工会派往各区、县、局以上机关(包括市革委会各组、办)担任领导职务的有一百多人。而区、县、局党委要委任、调动工会干部，一定要经过总工会同意、批准。张春桥、王洪文还经常强调，工会有责任培养、输送干部，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工会，为“四人帮”网罗、培植和安插他们信得过的人。因此，凡是送往各区、县、局担任领导工作的新干部，很多人都参加过总工会办的学习班，或者在总工会工作一段时间，经过考察、了解的，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为了扩大总工会这个山头，我提出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新干部，都吸收列席总工会常委会，王洪文同意，就这样做了。“四人帮”和我利用总工会大搞封建帮派，结成死党，自成体系，为所欲为，广大工会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罪责在我身上，根子在“四人帮”。

四、交代紧跟“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罪行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到处煽风点火，把矛头直指周总理，阴谋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打下去，进行反革命夺权。我跟着“四人帮”，也干了许多坏事，犯下了严重罪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王洪文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下达“四人帮”的黑“指示”，说什么“北京开两个万人大会，国务院各部的万人大会，军队的万人大会，你们

为什么不动？”他下命令说：“总工会要抓大事，批林批孔就是大事，总工会要打头阵，可以召开万人大会，你要去讲话”。接着又别有用心地说：“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联系九、十次路线斗争的实际，清查林彪死党余孽。”我听了这些黑“指示”，就积极贯彻执行，一面向市委常委进行传达，一面跑到总工会常委会上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工会打了“头阵”，二月二日召开万人大会，会上有的点名批评某某局党委领导不力，有的指责某某人有什么“黑后台”，等等，使许多区、县、局党委陷入了被动局面。之后没有几天，王洪文又传来一个黑“指示”，说上海某某厂压制造反派，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二月九日，马天水和我又赶到该厂去放火，发动群众揭矛盾，还要叶昌明坐镇在那里抓。结果，这个厂也乱起来了。面上有些单位，受到总工会大会和这个厂等揭矛盾的影响，出现了乱点名的情况。

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布置总工会在二月二十三日召开工会干部会议，组织七个发言，其中也有“老造反”讲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发言。会上，徐景贤也发了言。二十四日，《文汇报》把徐景贤的讲话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后，总工会这帮小兄弟大闹起来，我就批评报社。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也大为恼火。王洪文打电话来大发脾气说：“谁叫你们发表《文汇报》文章的，你们知道在全国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有的省批林批孔运动的火刚刚烧起来，现在就等着《文汇报》文章去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张春桥也指责：“徐景贤有什么权利对‘一月革命风暴’乱解释！”二十七日，他还专门给马天水写来一封密信。张春桥在这封密信中，劈头就说：“《文汇报》的思想评论，我觉得写得不很好”，“特别是对一月革命风暴的精神，解释的不对，抽掉了向走资派夺权的基本内容，还有什么一月革命风暴呢？”接着他借题大做文章，把批林批孔说成是夺权斗争，胡说什么：“老实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些方面一些单位的权（不是林彪讲的那个权、权、权，即资产阶级压无产阶级之权），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一月风暴中夺过来，有的夺过来又失掉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也就在这里。”“不然，还批林批孔批复辟、倒退干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多次？”等等，一语道破了他们肆意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战略部署，妄图篡夺党政军大权的天机。但是，张春桥这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生怕露了他们“四人帮”的底，在密信的最后又说什么：“我的这些意见，也不要印发，更不要弄到报上去了。”同一天，张春桥对一份组工简报又作了黑“批示”，提出什么要“注意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新的积极分子”，特别强调“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妄图把他们没有夺到的权，或者他们认为“夺过来又失掉了”的权，利用批林批孔这个“有利时机”，夺到他们自己的手里，用心十分险恶。

马天水、徐景贤和我，接到了王洪文、张春桥的这些黑“指示”，就再次到处去放火。马天水和我一起跑到总工会，要工会召开所谓“老造反”座谈会，进行煽风点火，总工会后来就派出一批联络员，到区、县、局去抓运动。马天水、徐景贤和我几

个人，还有时一起，有时分头跑到好几个工厂去放火。在我们的到处煽动下，不少单位出现了“三箭齐发”、“四箭齐发”，层层揭矛盾的混乱情况，甚至提出“搬掉绊脚石，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给一些同志扣上了所谓“复辟倒退”、“右倾翻案”、“否定新生事物”等等罪名。

三月二十日，为了进一步得到“四人帮”的黑“指示”，以便更加忠实地、卖力地贯彻他们的意图，我同马天水商量后，经王洪文、张春桥同意，由我一人到北京去汇报情况。当时，组织组的王日初，因王洪文指名要他去参加一个专案组的工作，我们两人一起去了。这次去北京，是秘密的，其他常委都不知道。我穿了接待外宾的衣服，坐了试飞的波音707客机（不买票），偷偷摸摸走了。二十日晚上到了北京，廖祖康把我们接到钓鱼台王洪文那里，王把在工农兵读书班的金祖敏和安徽的某某等人请去，一起吃饭、看电影。从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这三天中，除了跟王洪文出去看他打猎一次，去看望一位老首长，和到中央读书班去过一次外，就是在那里等王、张、姚三个人一起谈话，听取他们的黑“指示”。这三天中，王洪文也断断续续地同我谈过一些话，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大肆攻击解放军，大放乱军的谬论。一次他对我说：“军队里九、十次路线斗争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特别是某某、某某、某某等单位，盖子都没有揭开”，“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揭开，人换了路线没有换，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变。”还有一次他说：“中央的态度是支持广大革命群众（他说的“中央”实际是“四人帮”）。领导去点火，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有的小干部当面指着司令说：‘鄙视你这个司令！’我批了铁道兵的一封信，那里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说明王洪文以批林批孔为名，妄图把军队搞乱，篡夺军权，这是个巨大的反革命阴谋。他同我谈话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要上海抓紧干部工作，培植他的亲信。我到北京时，带了王洪文要的海上筹办召开党代会、人代会的名单，还有准备参加各组办领导工作的人员名单，共三个名单。这些名单他没有细看，说到同张、姚一起接见时再说。他只是对我说，关于干部问题，上海要准备二十几个人。要我们选一点人，抽上来考察，到各组办工作，作为准备，将来中央要调人，下面就有人接下去。他还对我说：“上海工作无非是抓两条，一条是抓阶级斗争，一条是培养干部。林贼一伙都能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一些青年干部呢？”看，王洪文就象林贼一样，蓄意培植自己的死党，他的所谓干部工作，就是为他篡党夺权作好组织上的准备。他还对我说：“国家机关（各部）的运动很重要，这些部门问题解决了，对全国有影响。”这说明，王洪文早就妄图篡夺国务院各部的领导权，妄图打倒周总理，自己取而代之。那次，王洪文还告诉我，江青要上海挑选两个工人到文化部去掺砂子。这事后来我们做了。

等到三月二十四日下午，王、张、姚三人才一起找我谈话。我汇报了上海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和下一步打算，他们边听边谈，谈了两个半小时，作了很多黑“指

示”。对于批林批孔运动,张春桥说什么:怎样搞学、批、联,“要抓一批好的单位,抓一批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复辟的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了很多新生事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从群众中还会涌出新生事物,要支持,要发扬。总结了经验,你们心中有数了,别的地方武斗,我们也不受干扰”。又说什么:“上海工作,你们放手去做,出点岔子也不要紧”,“上海你们要放手工作,工、青、妇放手让他们去做,你把上海工人队伍抓好了就行了”。王洪文也说:“上海工人阶级这支队伍稳住就好。”谈到郊区运动,张春桥要我们搞个县试点,说什么“如果乱了也才一个县”。王洪文插话说什么:“九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也可以揭”。谈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姚文元说什么“不是经过一、两次路线斗争就能解决的”,“要害部门要抓好,如电台、报社、机场、大饭店,等等,这些地方还要警惕,林贼就是要霸占这些地方,现在还要警惕”。谈到干部问题,张春桥说什么:“这次运动是发现锻炼干部的好机会,各组办、工青妇都可以抽人上来锻炼,如中央要,就可以输送”。真是黑话连篇,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一伙的罪恶阴谋。

我接受了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在三月二十五日赶回上海,先向马天水汇报,后向市委常委作了传达(传达张、姚、王三人一起谈的黑“指示”),积极贯彻了这些黑“指示”。结果,揭矛盾、搞夺权的阴风越刮越大,鬼火越烧越旺,有的单位党组织靠了边,有的几乎垮掉了,有些单位把大字报送到市委有关部门。王洪文、张春桥这些家伙,原来想乱下面,乱人家,对自己是要稳住的,结果火烧到自己的老窝来了。正当这时,党中央发出了十二号文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明确了运动方向。这样,上海的运动才来了急刹车,急转弯。但是,对外地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四人帮”一伙疯狂地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大搞反党乱军,妄图篡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毁我长城,罪恶滔天,我紧跟“四人帮”一起干了大量坏事,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罪行累累。

五、揭发“四人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交代我插手

国务院一些部门,大搞分裂主义的罪行

去年,我去参加四届人大,人大闭幕后,我同马天水到张春桥那里,他对我们说:某某某和某某某两位副总理,还有计委一位副主任,都是邓小平提名的。当时,“四人帮”妄图“组阁”的阴谋被毛主席揭穿后,他们贼心不死,继续进行分裂活动,他们早就蓄谋要打倒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妄图取而代之。

一次,听金祖敏对我讲过:中组部某某某同志有问题,邓小平的一些人,都是通过他给安排的。他还要把原来全国总工会的一位同志放在全国工代会筹备小组名单的前头,这个人糊里糊涂,我不同意,把他给顶回去了。金祖敏还贬低、污蔑某副总

理胆子小、没有魄力等。今年二月，谢静宜也给我讲过中组部这位领导同志的坏话，说他硬要把某人安排到某省去当省革委会副主任，听说当地报上已给公布了。谢还说：有位新干部到中央组织部后，被他们吃掉了，跟某某某跑了。今年五六月份，听到廖祖康对我们（马、徐和我）说：中组部的问题揭开了，某某某有问题，他的上面是某副总理。对攻击中组部领导同志的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有的话我也给别人传过。这是我攻击中央部门领导同志的一条罪行。

去年，王洪文在上海时，对我讲过：邓小平下手快，他把好些地方的人事都给安排好了，现在还有啥办法？今年二月，张春桥也对马、徐和我讲过：去年邓小平早把人事给安排好了，所以他基础雄厚，现在斗争阻力大。中央讨论人事问题时，邓小平就提出一大堆名单，看也来不及看，他就说大家没有意见，就这样算通过了。可见邓小平下手是很快的。王洪文、张春桥这些黑话，以批邓为幌子，实际上包藏着大搞分裂，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的险恶用心。但是，当时我对这些黑话却很听得进去，而且跟着他们搞了分裂主义的勾当。

今年，某部长陪外宾到上海，后来又在上海主持某会议的时候，我们去看过她几次。她对徐景贤、马天水和我讲了不少攻击部队领导同志的话，如说某某军区一位领导同志怎样怎样不好，某某部队一位领导同志有什么什么问题。还讲了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是个新干部，到商店买服装时，怎样受到服务员的侮辱；有一位领导同志是个新干部，派人到医院去拿药，护士不让给，等等，可见新干部到处受排挤。她还说，有一些老干部身体很好的，可是运动一来就住医院了，生了一种“运动病”“政治病”，医院对这些人到照顾得好好的，等等。这些话，挑拨了新老干部的关系，攻击了解放军的领导同志，但当时我却听进去了，有的还加以扩散。

去年十二月，有位副委员长陪外宾来上海，我问这位领导同志：北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怎样？他说：很闭塞，不大知道情况。我说：上次开全国工资会议，右倾翻案风可刮得很厉害呵。他说：我可没有刮。我说：你刮也不要紧等话。当时我还极其错误地对别的同志说：看，一位副委员长，连情况也不知道，怎么能发挥作用呢。这完全是一种分裂主义的、攻击性的言论，是十分反动的、狂妄的。

我交代插手外交部，破坏外交部运动的严重罪行。外交部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我们竟然跟着“四人帮”，把黑手伸向外交部，大搞分裂主义，这是反毛主席、反周总理的反革命罪行。一九七四年时，曾听到文化部刘庆棠、浩亮对马、徐和我讲：某某某这个人很狂，说江青坏话，攻击江青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安排江青的外事活动，很难安排。后来又听他们讲：江青设计的连衫裙，外交部的几位女同志不穿。江青批评她们为什么不穿，某某某说：这是强加于人。我们听了后，感到某某某同志不尊重江青。去年，王洪文对我们（马、徐和我）讲过：某某某这个人称王称霸，谁

都要训。某某某还骂我(指王洪文)是“霸王”，是“王八旦”，等。从这以后，凡是外交部有人陪外宾来，我们就要摸情报，打听来的人到底是哪种观点的，凡是和某某某同志不对的，我们就接近，交谈情况，态度热情。有一次，外交部有位同志来，我问他们情况怎样。他说：批邓缺乏材料。我们就把上海召开的批邓经验交流大会的材料，以及有关邓小平言论等都送给了他。一次，有一位副部长来，我们跟他一起吃饭。他说，某某某如何如何称王称霸，欺侮老干部等。我们都听进去了。当时，马天水说：卫生部给毛主席打报告，主席批了，就点名批判某某某；外交部也可以打报告嘛，主席一批，就好点名批判了。有一次，听某某某同志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外宾不到上海来，这是某某某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安排的。这个话我们听了后，还对下面传过。有一次，有位外交部领导核心陪外宾到上海来，我问他外交部批邓批得怎样，他说还好。后来知道他是倾向某某某同志的，就不再问他了。我还派其他同志找他摸情报。

我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对于从上海调到国务院各部去工作的人员，竭力做他们工作，要他们效忠“四人帮”，多向“四人帮”请示报告。这样做，完全是在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把自己凌驾于中央、国务院之上，罪行是十分严重的。比如有位同志，我听说他到某部后，听部长的，不听张春桥的。因此我们说过：他被人吃掉了，不起作用了。今年八一节时他来上海，他讲了同迟群有矛盾，我们(马、徐和我)都做他工作，要他搞好关系。要他有问题多请示张春桥。他去北京工作时，我专门同他谈过话，要他到部里后，有情况多找张春桥。但是去年他不向张春桥报告工作。所以张春桥也认为他不起作用。

祝家耀，王洪文很赏识他，说他到公安部后很得力，因为情况都通给王洪文。去年，王洪文在上海时说起：祝家耀从某地搞到一份攻击江青的材料，送给了他。今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时，我几次给祝通电话，他告诉我北京的情况，他还攻击某某民兵，说什么给他带三千民兵到天安门广场去，有的不愿意去，他就让这三千人统统回去了，一个也不要。他还说：某某民兵就没有上海民兵那样的战斗力。这些话，完全是对某某民兵的造谣污蔑。那时，他还告诉我，抓了某某某的儿子，参加这一事件的还有一些高干子女，正在追查。他还讲过，追查谣言，追到一位副委员长的家里去了。就查不下去了。今年五月底，他带了一批人到某地去追查“总理遗言”，路过上海，他说：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会上张春桥说，“总理遗言”不是一般人能伪造得出来的，一定出在上层，范围很小。意思是从政治局出去的。因为祝家耀紧跟“四人帮”，所以我们对他也特别关心。

当一位同志调到某部工作时，我对他说：要好好工作，你是派进去的工人代表，有事多向王洪文请示汇报。就是要他紧跟“四人帮”。后来，他经常到上海来，我曾批评他说：你到北京后，脚跟还没有站住，怎么经常往外跑，你再回上海就不欢迎

你了。意思是要他把部里的权牢牢掌握好。这些话，都是为“四人帮”效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作准备。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我过去口头上也讲要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是实际上是忠于“四人帮”。仗着“四人帮”撑腰，听了“四人帮”的黑“指示”，就到处插手，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以革命左派”自居，把别人都看成是“右的”、“不革命的”，狂妄到了顶点。实际上，“四人帮”就是以上海为据点，建立了另一个中央。我紧跟“四人帮”，参与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犯了分裂党中央、国务院的严重罪行，我要低头认罪。

六、交代插手外地运动，破坏上海同外地关系的罪行

某省的某某某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后，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病。他来上海后，我去看过他多次。他对我讲了不少某省的情况，说省委有人怎样迫害他，把他们一些人打下去。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我把某某某的讲话等材料送给他。十二月底，请他到复旦、师大去看大字报。后来，他还组织一批人到上海参观大字报。今年一月三十日，我给他转过一封信给王洪文，这封信是告某省委状的，信中讲了某某、某某、某某等地方的情况。我转这封信时附了张条子，意思是说这位同志在上海治病，他反映了一些某省的问题，特此送上。以后，四月七日我还给他转过一些所谓“告状”材料。他还告诉过我，他们那里有一些人被挂职下放，有的被调到很远的地方，省里还准备把他下放到很远地方，因为他有病在治疗，才未实现。我听了这个话，也对别人说过。今年二月，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后，我把在北京期间听到的“四人帮”讲某省委领导的话都告诉了他。还把王洪文告诉我，他那封“告状”的信已印发给政治局同志的话，也告诉了他。这实际上是支持他，给他打气，干扰、破坏某省的运动和形势。二月份中央打招呼会议后，某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到上海来，要我们做做这位同志的工作。当时，我们（马、徐和我）认为这位领导同志的态度不明朗，立场没有转过来，所以没有帮助他做这位同志的工作。现在想起来，当时这样对待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也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支持了这位同志闹下去。到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时，这位同志曾要市委代他发了以个人名义给中央的电报，马天水和我同意给他发了电报，这事也没有告诉某省委。今年二月，某省委另一位领导同志将要出国，来沪看这位同志，马、徐和我去看了这位省委领导同志。马天水对这位领导同志说：你还是不出国，留下来，把某省问题的盖子揭开来好，是不是我给廖祖康打个电话，对王洪文说一声？后来因时间临近，电话没有打（我也同意马天水的意见）。这不仅是对某省委的干扰和破坏，而且俨然凌驾于兄弟省的省委之上，完全把自己摆错了位子，可见当时我们仗“四人帮”撑腰，头脑是多么膨胀，完全是忘乎所以，完全

是在犯罪。

一九七四年六月,我和一些同志到张家港看码头后,在回来的路上,还偷偷摸摸地特意弯到某市,在某地一带看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字报,内容都是讲某省委领导的,还打听某省的情况,刺探某省的情报。这也是搞阴谋诡计,插手某省的运动。

今年六七月间,某省一位同志到北京去路过上海,原来安排住和平饭店。马天水知道后,就把他一人安排住到东湖。晚上,把他接到某饭店小礼堂,马、徐和我三人请他先看电影,然后请他谈谈某省情况。他就原原本本地从头讲起,讲到 he 去年因讲了点公道话,省领导同志就整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又把他放到边远地区去劳动,一直到今年元旦社论发表,才把他放回来。这些话,我们很听得进去,认为省委领导用的完全是法西斯手段。当他讲到要揪县委书记时,徐景贤说不要揪下面,矛头要指向省委,指向邓小平。我们还说:你到北京,可以向中央领导(意思是指张春桥他们)去反映反映情况。我们这样做、这样讲,完全是对兄弟省运动的插手和破坏。

某省有一位同志到上海来时,讲了某某、某某地方的情况,黄金海向我讲了,我就叫黄金海带人去看她,把她讲的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这份材料,马、徐和我都看过,把它送给王洪文。这份材料是告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和某省委的“状”的。后来廖祖康把这份材料退回来了,说他那里已经有了。大概是黄金海已直接送去过一份。

去年十月,我因父亲患病,回家过一次(全家四人和一个警卫员),在某某和某某地方前后一共住了十一天。到某地时,去参观某化工厂,他们介绍了怎样同“条条专政”作斗争的情况,我也谈了上海怎样搞大会战的情况。在某市时,去参观过六二八胶片厂,某市委同志介绍说这个厂是毛远新抓的点。我也讲了一些吹捧毛远新的话,说毛远新的点选得好,最后看了用他们片子拍的电影。还邀请他们到上海来介绍经验。某省委某某某同志告诉我:某省也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得很厉害,还有人攻击上海,说“上海难道什么都好”,他就讲,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好有什么坏处呢。七、八、九月谣言那么多,很多是从部队里传出来的。这位同志还对我说:到上海参加金山石油化工厂的现场会议,听到国家机关的有的副部长在那里攻击文化大革命,等等。我同这位同志谈得很投机,因为观点差不多。我就把去年邓小平六月份来上海时讲的关于“多劳多得总是好的嘛”等话,还有邓小平在钢铁生产座谈会上讲话内容,都同他谈了。我还把王洪文说的“今后斗争的焦点还是在于承认还是不承认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的话也告诉了他。这位同志还告诉我:有一位副总理到东北来,专门找了一位老同志谈话,一起控诉文化大革命。我同某省委这位同志的交谈,实际上就是在搞串连,矛头是指向国务院和解放军的领导同志的。那次,我从某市要回上海时,毛远新在北京,我未碰到,毛

远新要他的秘书送给我从新疆带来的一只哈密瓜和一些梨子。对毛远新，我曾经几次为他吹捧过。记得在参加四届人大回来后和今年十月七日到某县时，我都吹过毛远新在某省怎样大胆提拔、使用青年干部，步子迈得大，我们要向他学习，等等。

×

×

×

这些年来，我紧跟“四人帮”，陷得是很深的，罪行是很大的。我受“四人帮”的影响、毒害年深日久，我同“四人帮”的关系，特别是同王洪文、张春桥的关系十分密切。现在，要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划清界线，肃清这种影响，就要经过艰苦的斗争，经过脱胎换骨的过程。这些天来，在领导同志和大家的教育、挽救下，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自己的认识有提高，立场有转变，但是这个转变还是很缓慢的、很不够的。我决心努力加速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要继续进行揭发和交代，要彻底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滔天罪行，彻底交代和清算自己紧跟“四人帮”，死保“四人帮”，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严重罪行。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最大的挽救。我一定彻底转变立场，站到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决不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殉葬品，决不辜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自己的教育、挽救，不辜负同志们对自己的教育、批判，请党和人民看我的行动。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